

泰國華僑崇聖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
清華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
中山大學中華文化研究中心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主辦

第九、十輯（四）

饒宗頤

主編

學

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明神宗經筵進講書考*

朱鴻林

明代朝廷有經筵和日講制度，由翰林院和詹事府官員為主的儒臣向皇帝或皇太子解讀經史子類書籍，講論修身和治國道理，藉以灌輸以儒家思想為主的政治觀和價值觀，提醒當前政府需要注意的事情以及給予處理事情的原則等等。在這個制度的運作中，君臣雙方講論了什麼典籍，是我們了解皇帝能夠在正式場合中獲得什麼知識和道德教訓的重要資訊。明神宗在明代皇帝中享國最久，本文考究他從東宮時代開始讀書和聽講的情形，重點在於知道儒臣們向他講說過哪些書籍。這有助於我們知道他對傳統文化認識的廣度和深度，也能增進我們對於明代宮廷文化的認識。

明神宗的經筵講學在隆慶六年（1572）他身為皇太子時已經開始^[1]，但為時只有兩個月，因穆宗皇帝駕崩而結束。此時主要的講學形式是每日的“講讀”。給他組織和提調事情的是當時的首輔高拱^[2]。神宗即帝位不久，高拱失勢，被放逐回家，組織和提調講讀事情改由新任首輔張居正負責。皇帝的講讀活動分為“經筵”會講和“日講”兩部分。依照當時所定的儀制，經筵在春秋兩季舉行：春講由二月十二日到五月初二日，秋講由八月十二日到十月初二日，分別在這兩段時間內的每月初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舉行。日講則在此外的日子舉行。舉行的地點都在文華殿^[3]。神宗的經筵在改元萬曆之後纔舉行，為了表示殷切向學之心，首次的經筵在萬曆元年（1573）二月初二日舉行^[4]，比制定的日期早了十天，亦即多了一次。日講則在改元萬曆之前已經舉行。第一次是隆慶六年八月十八日^[5]。由於神宗登基時纔十歲，體力幼弱，知識、才能也不勝任朝廷事務，閣臣和內宮於是議定，每月逢三六九日（包括初三、十三、二十三、初六、十六、二十六、初九、十九、二十九各日）視朝，其餘日子均御日講^[6]；後來經筵也在這些日子之內舉行。這三六九日視朝的做法以後成為慣例。但三六九日之外的日子，實際上並非每天都有講學活動，即使在神宗最用功向學的時候，也因為天氣、時節、祭祀、朝廷典禮、皇家慶弔、帝后忌辰、皇帝健康等等原因而屢有停止，甚至有較長的暫停情形。

整體上看，隆慶六年秋天到萬曆十年（1582）夏天這十年之內，神宗的經筵和日講講學是經常的，並且一般是認真的。這是外廷首輔張居正的堅持，內宮神宗生母慈聖皇太后的嚴格要求，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的約束，這三種力量結合而產生的結果。除了萬曆八年冬天的越軌嬉遊之外，神宗這十年用功力學而且所得匪淺。但勤學的情形在萬曆十年六月張居正卒後，開始

* 本文係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資助局 CUHK4681/05H 項計劃部分成果。

日漸消失。萬曆十三年起的經筵和日講都是間接式舉行的，而且隨著神宗與廷臣因為國本（儲君之立）之爭而關係緊張，愈來愈少舉行。萬曆十六年閏六月，首輔申時行因為神宗已經缺席講筵很久，請求在免除講讀的時候，容許講官繼續撰寫講章進呈閱覽。神宗允許所請^[7]。自此之後，經筵講讀基本上便以這種人物缺席而講章進覽的形式進行。神宗最後一次御經筵在萬曆十六年八月^[8]，最後一次御日講在萬曆十七年二月^[9]。而且，萬曆十七年八月視朝之後，除了幾次的例外，神宗便沒有再度視朝和御殿了。萬曆朝的中央政府政治，從此進入日漸衰頹的局面。輔臣乃至廷臣屢屢請求恢復視朝和講讀，以便百官能夠朝見皇帝，皇帝也能夠進學和與輔臣講官接觸。神宗始終沒有答應。但因為經筵講讀的制度仍然存在，所以講官仍須不斷撰寫講章進呈，而神宗對於這些講章也時有閱讀。這樣的情形至少要到萬曆四十三年纔不了了之地停止。

神宗在日講講筵上所讀的書籍，《萬曆起居注》和《明神宗實錄》均有記錄。經筵進講的講題，也都出於這些書籍，尤其《四書》和《書經》，講章在很多講官的個人文集中仍能見到。從萬曆元年年終起，在張居正的主張下，內閣又開始了每年年終時將該年進講過的講章重復校閱，裝潢進呈，然後由內府刊行的做法。刊行這些講章的事情，雖然在張居正卒後少見施行，但年終進呈講章的做法，卻到萬曆四十三年纔未再見。這些講章所從出的典籍，《起居注》和《實錄》同樣有所記載。以書本形式刊行過的講章，書名都類別性地稱作《直解》，有些刊本至今仍然存在^[10]。根據這些記載和刊本，我們可以知道神宗在位四十八年中，絕大部分時間內讀過和聽講過那些經史子類典籍和其他書籍，甚至能夠推測他對這些著作的閱讀和理解情形。

二

根據明人呂毖《明朝小史》記載，神宗在隆慶六年三月出閣讀書時，曾回答過輔臣的詢問，說是時“方讀《三字經》”^[11]。據《明神宗實錄》記載，神宗後來曾經自言，五歲已經讀書^[12]。萬曆元年的朝鮮使臣，還向李朝朝廷報告了如下一段得諸傳聞的誇張之詞說：神宗“聖資英睿，自四歲已能讀書。……《四書》及《近思錄》、《性理大全》皆已畢讀。自近日始講《左傳》，百司奏帖親自歷覽，取筆批之，大小臣工莫不稱慶”^[13]。從《實錄》所載看，可以無疑的是，神宗在東宮時，已經開始講讀《四書》中的《大學》和《五經》中的《書經》。這個次序是明朝帝王講筵講讀的正常次序。神宗此時有沒有同時閱讀史書，記載不甚清楚，但看來他可能也在閱讀《資治通鑒》的簡明本《通鑒節要》。

神宗登基後，在張居正擬訂的讀書日程下，繼續與日講官講讀《大學》和《尚書》，這部分的講讀在清早進行。約上午十一時再上“午講”，聽講官進講《通鑒節要》。張居正定下的講讀程式相當嚴謹。當時的日講儀注訂明，讀書部分“先《大學》十遍，次讀《尚書》十遍，講官各隨即進講”。接著是稍息，接著是〔形式上的〕聽取和閱覽司禮監所進呈的各衙門章奏。之後是習字。接著便是午講史書（《通鑒節要》），講官被要求“將前代興亡事實直解明白”。午講結束後，皇帝才還內宮。張居正鼓勵神宗，在早講和午講講官講完後，“聖心於書義有疑，即下問，臣等再用俗說講解，務求明白”。在三六九日視朝而暫免講讀的日子裏，也要“官中有暇，將講讀過經書從容溫習，或看字體法帖，隨意寫字一幅，不致工夫間斷”。並且“非遇大寒大暑，不輟講讀；本日若遇風雨，〔才〕傳旨暫免”^[14]。

爲了輔助神宗的歷史知識，提高他對歷史的興趣，以及盡早認識足以引爲鑒戒的歷代君主

事情，張居正囑托日講官陶大臨、馬自強等編寫了故事性歷史啓蒙書《帝鑒圖說》給神宗講讀^[15]。此書上下兩卷，內有歷代帝王自帝堯至宋徽宗故事 117 則。上卷總題作“聖哲芳規”，說“善可爲法者八十一事”，下卷總題作“狂愚覆轍”，說“惡可爲戒者三十六事”。“每一事爲一圖，後錄傳記本文”。書名則取唐太宗“以古爲鑒”之意。此書隆慶六年十二月張居正率講官在文華殿進呈。神宗次日“手諭嘉獎，賜〔輔臣及講官〕金幣有差。自是日置圖冊於座右，每講輒命居正解說數事，以爲常”^[16]。

《帝鑒圖說》以後在正式的經史講讀之後由張居正親自講解。此書後來的刊本之中，有的也將張居正（或其他講官）的講解編輯在內^[17]。《實錄》記載了神宗閱讀時或閱讀後有所反應的場合。據此可知，萬曆元年三月進講過此書上卷第二十三篇《屈尊勞將》（漢文帝事）^[18]；萬曆元年十月進講過上卷第七十五篇《不喜珠飾》（宋仁宗事）^[19]；萬曆三年三月進講過上卷第三十二篇《賞強項令》（漢光武帝事）^[20]；萬曆四年三月有連續二日進講上卷第四十篇《納箴賜帛》（唐太宗事）^[21]、下卷第三十篇《寵幸番將》（唐玄宗事）^[22]。這次兩天連續進講的篇章在書中並非連續，此時距離此書初次進呈也已經四年有多，可見此書神宗在日講講筵上已經全部講過，至少也自己在宮中已經閱讀一過，此次只是屬於抽取式的溫習講論。由此可見，《帝鑒圖說》是神宗青年時認真讀過的書籍。

神宗固定的經史講讀進度，從萬曆元年十二月張居正請求進呈該年講過講章的編輯本時起大略可見。是年內閣已經能夠“編成《大學》一本，《虞書》一本，《通鑒》四本”^[23]。這些經典之中，《大學》應該已經講完，雖然張居正的呈請中並無說明。萬曆三年十二月初一日，神宗“以刻定《大學》、《中庸》、《尚書》典、謨、《通鑒》盤古至漢平帝《直解》十五冊，賜輔臣張居正三部，呂調陽、張四維各二部，講官申時行等六員各一部”^[24]。這種“直解”的講章刻集，以後還有。這裏可以肯定的是，《大學》和《中庸》已經全部講過。《尚書》也講完頭四篇的《堯典》、《舜典》、《大禹謨》、《皋陶謨》。要注意的是，這裏說的《通鑒》，應該還是《通鑒節要》。

在萬曆紀元頭三年之中，神宗在日講講讀和在宮中閱讀的書籍，其實不止上述這些。萬曆二年十月，他因爲追問建文皇帝的故事，讓張居正給他誦讀和寫進世傳的建文皇帝雲南題壁詩。張居正也乘機向他推薦以及進呈明太祖自撰的《皇陵碑》以及御製文集。神宗認真地讀了《皇陵碑》，感動之餘，表示了要“勉行法祖”的意願^[25]。萬曆四年六月“新刊《洪武正韻》，賜輔臣及講讀、正字等官”的事情^[26]，可能便是當時這個意願的結果之一。神宗自己此時在宮中的閱讀非常認真。萬曆三年七月《實錄》記載，他命“中官持《尚書》一帙，至《微子之命》篇，用黃紙乙其處，以示輔臣。〔中官〕言上於宮中讀書，日夕有程，常二四遍覆背，須精熟乃已。輔臣及講官相顧嗟異，以爲上好學如此，儒生家所不及也”^[27]。同年十月，神宗又命中官持《論語》講章到內閣，指問其中所引“南容三復《白圭》”一語的出處^[28]。由此可見，神宗除了真正的“究心問學”之外，此時日講已在講讀《論語》，而《尚書》已經講完，講到《周書》的第十篇了。

萬曆四年，神宗除了認真講讀《帝鑒圖說》，在三月中，能夠“不失一字”地將《納箴賜帛》（上卷第四十篇）篇中所載的唐太宗大臣張蘊古的《大寶箴》朗誦出來，並與張居正討論此文的要點（見前）。十月中時，還向輔臣出示成祖時所繪的《騶虞圖》。《實錄》記載此事說：“初周王得騶虞於神后山以獻，成祖令繪爲圖，先臣蹇義、姚廣孝及翰林坊監諸臣各賦頌歌贊以紀述之，聯爲卷軸，凡十餘本，藏之內庫。至是南京守臣以進，上命出觀，因以其一留內閣。”^[29]神宗閱覽此圖，自然也閱讀了永樂諸臣的文學作品。

踏入萬曆五年(1577)，神宗已經年十五歲，張居正引“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的古訓，請求他實際地向古代聖王學習，講讀經史之外，需要實習政務，要“省章奏，歷政事，日覽一二疏，將國家事講究明白”^[30]。自此之後，神宗的閱讀範圍，再不限於經史文字。

此時神宗也對詩歌產生興趣，並且像當時很多儒者一樣，喜愛宋儒邵雍的詩作。萬曆五年七月，他以邵雍的《擊壤集》賜給張居正等輔臣、申時行等講官和馬繼文等正字官^[31]。萬曆六年正月，他“出畫冊二十六幅，命輔臣分授講官申時行等各賦詩”進呈御覽。諸臣進詩時，“輔臣張居正並所藏先臣李東陽題畫詩冊進呈”^[32]。這次神宗要求的雖然是賀節的應制詩，但他對於文人傳統詩畫的愛好也明白可見。

萬曆五、六年的經史講讀也很積極。萬曆五年九月份內，《書經》已講讀過《康誥》篇^[33]。神宗也因以《洪範》篇中句子習字而通過張居正對其所寫字句意義的考問^[34]。十二月時，日講已經講到《酒誥》篇^[35]。史書講讀方面，萬曆六年十月，《通鑒》已經講到唐朝中期的德宗時代，神宗也引用了陸贄的“掣肘之說”來說武官受文官牽制的弊病^[36]。是年十二月，張居正等題進該年講過的《經書》、《通鑒》講章，內容是“《論語》直解《先進》起至《顏淵》止一本，《書經》、《旅獒》起至《無逸》止三本，《通鑒》唐中宗起至代宗止二本”^[37]。

萬曆八年冬天，講讀決定增加新的內容。是年六月，日講仍然在講《論語》。是月二十二日，講“益者三樂，損者三樂”章，張居正在講完後上奏說：此章“與前日所講‘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兩章書，甚有關於君德，伏望皇上回宮之後，留心省覽”^[38]。此時神宗在宮中與宦官宮女嬉戲夜遊，失德漸聞於外，故此張居正從日講內容引申作為婉轉的勸諫。同年十一月，神宗夜飲宮中，誤杖二內使幾斃，受到生母慈聖皇太后嚴懲^[39]，張居正也相應地在日講的講讀內容上作了調整。次月上疏，請求神宗仿效唐憲宗和宋仁宗的做法，講讀祖宗的訓話和政事。他報告了這樣的具體做法：“臣等謹屬儒臣將累朝《寶訓》、《實錄》逐一簡閱，分類編摩，總計四十款。”請“容次第纂集，陸續進呈，擬俟明歲開講以後，每講畢，臣等恭詣文華殿講解一二條，粗述大指。如皇上偶有疑難，即望面賜諮詢，或臣等竊有見聞，亦得隨時獻納”。神宗同意所請。這四十款的標題“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敬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卻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禦夷狄”。內容所涵蓋的，正如張居正所說，“雖管窺蠡測之見未究高深，而修德致治之方亦已略備矣”^[40]。

萬曆九年是神宗問學最見熱心的年份。首先是他顯示出對詩文和對句的愛好。是年正月，他出《玄兔圖》命輔臣及日講、侍直諸臣各詠詩一首^[41]。次月張居正等上呈《玄兔圖》卷，翰林諸臣和詩三十三首。“翌日，上覽畢發下，命各登卷以進”^[42]。此日之前，神宗“齋居，手書二對句，一曰‘靜裏收心涵養吾之德性’，一曰‘閑觀圖史知邪正’，命輔臣及日講侍直諸臣擬對進覽”。張居正回奏以“聖志清明，好尚端雅，不勝忻忭”的稱許^[43]。

二月份內，張居正又上言：“將累朝《寶訓》、《實錄》摘其切於君德治道者，分為四十款，次第纂修”事情，講官何維文等已經緝成第一款，並經閣臣“稍為更定，勒為《創業艱難》上篇，借題其〔書〕名曰《訓錄類篇》，繕寫進呈。”並且請求在日講之日，容許閣臣照“先年進講《帝鑒圖說》例，從容講解一二條，以後每纂完一卷即次第進呈，接續入講，庶於聖學聖政少有裨益。”神宗欣然留覽^[44]。次月，張居正便開始以《訓錄類篇》進講^[45]。日講之後講讀此書，在張居正在生時，是認真進行的。次月(四月)，《實錄》便有“上御文華殿講讀，有頃，

輔臣張居正等入至後殿，講《訓錄》畢，以南科給事中傅作舟疏進覽”以及隨著的對話的記載。此次對話說的是應對江北江南災傷的方法，張居正並且提及“《訓錄》中所載元末之亂亦起於此〔江北淮鳳等地〕”，作為應該認真看待事情的理據^[46]。但是，進講《訓錄》是張居正（首輔）的專利，所以在萬曆十年六月張居正卒後，看來是很少甚至沒有進講的。萬曆十年七月，新任首輔張四維等便奏稱此書“每款遇講筵既畢，臣等講解一二條，其諸司章疏有緊要者，即于講後面奏請裁。已于去歲春月奉行，因臣居正在告，暫行停止。今時已入秋，天氣漸涼，伏望皇上每御經幄之日，容臣等仍以《訓錄》進講，并以緊要章疏面請”。但神宗只是“報聞”而已^[47]，《實錄》也再沒有講讀此書的記載。

《論語》和《書經》也在萬曆九年講完，《通鑒》同年講至宋徽宗年間。是年十二月張居正奏准明年春天講《孟子》。並且認為《通鑒》“自此以後，皆徽、欽北狩，宋室南遷之事，無可進講者”。應該照隆慶五年（1571）穆宗自此即以《貞觀政要》進講的做法，明春即以這本“于君德治道實為切要”之書進講^[48]。並且要求命令“司禮監先以一部進上御覽，仍發一部到閣，以便撰定講章”^[49]。是月“張居正等以年終將講過經書《通鑒》講章繕本進呈，仍乞發下司禮監接續刊行”^[50]。這些講章包括：“《論語》直解《陽貨》起至《微子》止一本，《子張》起至《堯曰》止一本。《通鑒》宋太祖起至太宗止一本，宋真宗起仁宗止一本，宋神宗起至徽宗宣和四年止一本。”^[51]

萬曆十年（1582）正月，張居正等請在二月開講時，除了《孟子》和《貞觀政要》之外，進講《詩經》以接去年講完的《書經》，並且認為《詩經》“此書本人情，該物理，近之可以修身齊家，遠之可以治國平天下，於君德治道裨益不淺”^[52]。

萬曆十年十二月首輔張四維等題，類寫進呈以便溫故知新的本年講過經史，“除《書經》已經進完外〔按，此句恐有問題。《實錄》此條不提此書，只提《貞觀政要》〕”，有“《孟子》《梁惠王章句》一本，《貞觀政要》《君道》起至《政體》止一本”。張四維請求仍然“發下司禮監接續刊行”^[53]。神宗雖然從之，但以後未見刊書的記錄。《書經直解》應該也在是年刻成^[54]。張四維說本年《書經》講完，大概也指全書刻成而言。

萬曆十一年二月，張四維等題請經筵開講用書時說：“去年秋講《四書》、《書經》講完，今見講《詩經》，仍該用一經進講。《周易》一書，先王明天道以修人紀，其理雖奧衍宏深，至於擬議言行，會通典禮，關於君德治道，最為詳切。故自祖宗列聖以來，凡幸太學，必令儒臣以是書敷講，厥有深意。合無今次以《周易》同《詩經》進講，用為聖學緝熙之助。”^[55]神宗同意。是年十二月，新首輔申時行等將講過講章《梁惠王章句》下一本，《貞觀政要》《任賢》一本，類寫裝潢進呈^[56]。從是年大學士張四維所題進講用書的說話可見，直至此時的日講是同時進講經書二種和史書一種的。《貞觀政要》被視作接續《資治通鑒》進講的史書，雖然它的要旨特別在於講求“君德治道”。

萬曆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都沒有類編進呈該年講過講章的事情。其原因申時行在十四年十二月的奏疏說出：“今通查一年之內，日講不過數次，講章甚少，不能成帙。”^[57]此時神宗已經甚少出席經筵和日講，他的閱讀興趣也別有所在。

神宗這幾年的閱讀興趣，範圍殊不狹窄。萬曆十二年二月，申時行等為內府重刊書籍三種各擬序跋各一篇進呈。這三書是《資治通鑒》以及有實用性質的《類證本草》、《草韻辨體》^[58]。是時神宗的文學興趣也不少。萬曆十一年四月，大學士張四維等擬進《御製重刻古文真寶前序》、《御製重刻古文真寶後跋》。據序文可知，此書是神宗日講之餘，在宮中“游意篇章”時閱讀的文選。序文說此書的內容：“自廟堂著述，下逮里巷歌謠，群言雜陳，諸體略備。其稍有關

軼，見於《古文精粹》者，復取而益之，臚列類增。……舊本凡三百十有二篇，今益以三十五篇。”由此可見，這個重刻本其實還是個增訂本。跋文說這個選本的指歸和特色是“依經以立言，推本以訓俗，其詞茂而典，其義婉而章，其條貫森然炳然，臚分井列，莫不可觀，誠九流之涉津，六藝之關鍵也。”這些說話不免有所誇張，但也反映了神宗所閱讀的，並不止於經筵和日講時的經史經典^[59]。此書刻成後，神宗賜給大學士每人兩部，據申時行等的謝恩疏說的“皇上遜志典學，稽古右文，取《精粹》於藝林，萃《真寶》於冊府”，似乎《古文精粹》是外間編輯的，而《古文真寶》是內廷編輯的。萬曆十四年十一月神宗發下《瑞蓮圖》，命申時行等人各撰賦二首進呈。但從賞賜的情況看，進賦者只是輔臣，講官沒份參加^[60]。

神宗不御經筵、日講，日甚一日。萬曆十五年三月，左僉都御史魏時亮上疏要求他重視講讀。神宗答以“今後條陳章奏，事關朕躬，已奉旨者，不必再覆”^[61]。同年十二月閣臣申時行等上疏，提出隨時開講、隨時召問的變通之法。神宗回答給予嘉許，但以“屢屢動火，眩暈不時，……待新春稍豫，與卿等講習”說話了事^[62]。這兩篇奏疏都沒有起到儒臣們所期待的作用。

但神宗雖然不御日講，卻也不是在宮中全不讀書。經筵所講書籍乃至講官所進講章，他看來還有流覽，有時甚至認真閱讀。萬曆十六年二月發生的事情清楚地反映了這點。是月十三日，神宗御經筵完畢，與閣臣連番論辯魏徵之為臣及唐太宗之為君皆不足為訓，因而命令經筵罷講《貞觀政要》，改講《禮記》。此事看來複雜，需要另外研究以見底蘊。但事情的結果便是《禮記》首次進入講筵。當時閣臣要求同時進講孝宗朝命閣臣編撰的《通鑒纂要》，以及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因為此書“世宗嘗講之，洵經史格言之林也”。神宗答以此二書及《書經》都是他“朝夕常看”的，命令“今且以《禮記》代《政要》，《通鑒》候《尚書》完日續講”。這樣，《書經》又再度回到講席^[63]。罷講《貞觀政要》而講《禮記》，是明朝首見之事。再度進講《尚書》，也可能是除了太祖之外的僅見之事。神宗為了表示自己認真，在《禮記》初次進講之後，還傳諭指出講官左庶子劉虞夔“遺脫字句”的事實，要“日講官宜加習熟”，讓大學士申時行等要代劉虞夔的“一時皇遽”之過請罪^[64]。

萬曆十六年閏六月起，隨著閣臣申時行等請求的生效，日講實際上便以進講章代替了皇帝親御講席的傳統^[65]。是年十二月，申時行等還奏定了因應正月上旬講期與祭祀日期沖突的新做法，講筵以後每年新年假後，在“正月上旬先擇吉開講一次，仍暫輟講，至二十日後照常日講”^[66]。如前所述，萬曆十七年二月初二日己卯的文華殿講讀，是神宗這種活動的最後一次。以後所謂的進講，都是進呈講章而已。

從《起居注》和《實錄》所載閣臣請講的書籍和年終奏進的講章的書名、篇名看，我們可以知道萬曆十六年起神宗曾經過目了那些經典。萬曆十六年二月奉命進講的《書經》，十七年七月已經講完《秦誓》，全書講畢。依照從前命令，繼續每日進呈孝宗朝編寫的《通鑒纂要》講章^[67]。此時還在進呈的是《孟子》和《禮記》講章。

《孟子》講章在萬曆十九年二月進完，大學士申時行在數次奏請應該以何書接續不獲答覆後，終於徑以《大學衍義》講章進呈。進呈的同日，神宗卻傳命繼續進呈《易經》講章，不用《大學衍義》^[68]。是年十二月，首輔王家屏等進呈講過講章時說：“查萬曆十八年至今，所撰講章，除《易經》、《通鑒纂要》俟有成帙，另行寫進外，謹將《孟子》《萬章》、《告子》、《盡心》共六本，《禮記》《王制》上下、《文王世子》、《禮運》共四本，類寫裝潢進呈。”與往年一樣，閣臣也要求命司禮監接續刊行，但也同樣不獲復示^[69]。這種上奏不答的情形，以後一路持續。

《禮記》逐日進講，萬曆二十一年五月《儒行》篇將講完時，首輔王錫爵題請，此篇之後的冠婚等項六義，不關重要，但“《詩經》、《孝經》二書，皆經先師孔子刪定，詩得性情之正，孝

爲德教所先，以此進講，庶乎博而有要，可以羽翼諸經，日新聖學”，請求擇一書接續《禮記》進講。同時又建議：“若此外更有御前切要之書，或儒者格言，或祖宗故事，但憑聖意所喜，不拘何書，皆可傳講。”^[70]在王錫爵再度要求之下，神宗只答應以《詩經》接著進講^[71]。

據萬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日首輔趙志皋所題：這幾年來“講書三項，《易經》於萬曆十九年三月內進講章，自《周易》上經起，至今年十二月終，進至《繫辭》、《序卦傳》止，計六本，將完。《詩經》於萬曆二十一年五月內進講章，自《國風》起，至今年十二月終，進至《小雅》《瓠葉》章止，計四本半，未完。《通鑒纂要》於萬曆十七年七月內進講章，自太昊帝起，至今年十二月終，進至東漢光武建武八年止，計十本半，未完。”趙志皋請求“除《詩經》、《通鑒纂要》二項所餘本數陸續進講外，其《易經》待開春講完，臣另擬當講書籍，恭候聖明欽定遵行”^[72]。神宗一樣沒有回答。

日講進講的書籍和篇章，此時都由神宗自己選定，閣臣只能建議而已。趙志皋等在萬曆二十三年二月八日題奏：“每年初開日講，該進《孟子》、《書經》、《禮記》講章三條，已經進過數次。”他們請求“另擇三條進呈”^[73]。可見日講開講早已流於形式，連題目也多年沒有變更。

《易經》終於在萬曆二十三年四月進完。前一月，趙志皋等題：“五經《書》、《易》、《禮記》俱已講過，《詩經》現在進講，惟《春秋》係聖人筆削之書，可裨補聖學，尚未進講。”擬請《易經》講完，接著進講，准予預撰講章^[74]。神宗沒有回答。《易經》進完之後，趙志皋又請進“先朝常講”的《大學衍義》。神宗終於同意^[75]。

《詩經》在萬曆二十五年春天講完。將進完時，趙志皋等題請從《實錄》中每日摘取一條進講。神宗命講完時再請旨，不得輒撰講章。輔臣再請欽定進講的經書，亦不報^[76]。是時《大學衍義》及《通鑒纂要》仍在進呈，結果《詩經》進完後，接著數年都只進講這二書。

萬曆三十年閏二月十九日，《大學衍義》講章將進完，首輔沈一貫題，《四書》和《五經》中的《易》、《書》、《詩》、《禮》四經皆已講過，請准續講《春秋》及太祖、成祖《實訓》，容許預撰講章。神宗未予回報^[77]。沈一貫接著再題了兩次，仍然不報^[78]。《大學衍義》三月初六日進完，沈一貫再題：“講官敖文楨在任空過，莫效論思。獨朱國祚進《通鑒》講章一通，經今已八日矣。”請迅速指示，依然不報^[79]。次月，沈一貫再題請讓講官敖文楨效力，與朱國祚“對日分撰”《通鑒》講章，待新書命下，才仍舊分開撰寫。亦不報^[80]。敖文楨在是年十月病逝，閣臣請以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曾朝節補缺，有旨同意^[81]。但萬曆三十一年十二月沈一貫等所進年終類寫進呈過的講章中，卻還有講《大學衍義》的，雖然講的都是史事^[82]。

萬曆三十二年、三十三年進講的，只有《通鑒纂要》^[83]。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神宗終於傳諭內閣：“日進講章只一本，還著照舊再添一本。應進何書講章，先生每開具來覽。”輔臣因言“《大學衍義》講章進完，《學》、《庸》、《語》、《孟》及《易》、《書》、《詩》、《禮》俱已進過，惟《春秋》係聖人筆削之書，未經進講。又我朝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嘉謨善政，備載《實訓》，可爲萬世子孫法程，允宜進講。恭請於內欽定一書，以便撰進。”並且請求任命原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于慎行爲日講官，以減輕惟一的講官李廷機“每日獨撰講章”的困難。神宗兩者都同意，並命推選翰林現任官員二人補日講官^[84]。

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稍後，神宗又諭內閣爲內府重刊的明臣丘濬所撰《大學衍義補》撰寫序文。神宗說：“朕思孔子繼往聖，開來學，筆削魯史，《春秋》明善惡，順陰陽，百王不易大法，萬世君臣所當誦法者也。已有旨，卿等傳示講官，日每撰寫講章進覽。又朕閱先臣丘濬纂述《大學衍義補》書，古今事理備具，考論節目精詳，有神政治，嘉悅無倦。已命該監重刊傳佈，俾天下家喻戶曉，用臻治平，卿等撰一文來序于首簡，昭示朝廷明德新民，圖治至意。”^[85]

稍後“內閣撰上《御製重刊大學衍義補序》。上為嘉悅，賜元輔銀四十兩、彩段三表裏，次輔每銀三十兩、彩段二表裏，仍各賜酒飯有差。”^[86]此事沈德符認為與“妖書”案中，神宗因讀太監陳矩所呈《大學衍義補·慎刑憲》部分而釋怒之事有關^[87]。

是時神宗對於明朝的典章制書，也有所閱讀。萬曆三十四年三月二日，為冊封皇貴妃（皇太子妃王氏）事，神宗曾“查覽《皇明典禮》”。次日並以所看過書冊賜內閣儲存，又以一本賜禮部，“用備議禮稽考成法”。這裏反映了神宗所看書籍，也有廷臣所不知、未見及忽略的^[88]。

萬曆三十四年的上半年，卻因為沒有講官而沒有講章進呈。原因是原來惟一的講官李廷機請假三月^[89]，而新任的于慎行雖得旨而辭本未下，新推的葉向高和楊道賓則尚未得旨，都不能撰進講章。閣臣請諭李廷機早出，其他三人任命早下，神宗均不回報^[90]。三十四年進呈的講章，結果還是只有《通鑒纂要》^[91]。

《春秋》雖然在萬曆三十四年開始進講，但看來進度甚慢。萬曆三十五年到三十七年的年終所進類編講章，依然只是《通鑒纂要》而已^[92]。《通鑒纂要》事實上到進呈紀錄最後一見時，還在進呈。《春秋》則萬曆三十八年和三十九年可能也有撰進^[93]。

萬曆三十九年三月，輔臣李廷機、葉向高請傳諭“講臣進《寶訓》講章，蓋五經俱已講過，見今《春秋》講章將又進完也”^[94]。次月，內閣題：“日講《春秋》講章進完，擬以二祖《寶訓》撰述進呈，未蒙俞發。今與二講臣議，暫將《通鑒》分撰，仍候裁示。”^[95]神宗不答，閣臣只好接續撰進《通鑒》。

《實錄》所載最後一次的年終類編該年進過講章，講的仍只是《通鑒纂要》^[96]。情況見於萬曆四十三年十二月首輔方從哲等的題本。該本說：“今查撰進講章，謹將《通鑒纂要》趙宋初年四本，類寫裝潢進呈。”^[97]是時進呈講章之事，神宗和閣臣、講官都是各自敷衍而已。萬曆四十七年正月，方從哲題：“日講乏官，經今六載，聖學之作輟多時，祖制之廢弛殆盡。乞將禮部左侍郎何宗彥、右侍郎孫如游，原任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事今服闋顧秉謙，同充經筵日講官，撰述講章，進呈御覽，是亦新政之一端，臣民所佇望也。”神宗照例不報^[98]。

三

從以上的考述可見，張居正卒後進學情形每況愈下的明神宗，卻可能是明朝諸帝中講讀經史典籍數量最多和種類最完整的一人。《四書》、《五經》、《資治通鑒》、《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經筵經典讀物，他都曾經聽講和閱讀過解說。其中《禮記》、《易經》、《春秋》等書，尤為明朝帝王講讀活動中所少見，而像《四書》和《書經》還曾一再進讀。連同他正式出閣讀書之前所讀的啟蒙書籍，以及即位後在宮中自己閱讀或聽讀諸如《帝鑒圖說》之類的書籍來看，神宗的文字知識和對傳統文化經典的認識，顯然不在一般問學閱富的廷臣之下。他的閱讀興趣也泛及文學、文字、醫藥之類書籍。但他對於像《皇明典禮》之類的本朝典故之書、《大學衍義補》這類的經世之學之作，都未能更早地有所閱讀和加以講論。對於了解本朝政制興革和政治發展最有幫助的祖宗事跡和言論，如從歷朝《寶訓》和《實錄》彙編而成的《訓錄類篇》中所載的，他也没有多讀。這樣，他所閱讀的對他認識本朝歷史、立國精神和政治原則，其實幫助不大。

值得注意的還有，神宗在經筵內外所讀之書，其實和內廷宦官在內書堂所受正式教育中所讀之書基本一樣。據晚明宦官劉若愚所記，讀書內書堂的宦官學生獲發給的必讀書中，除了

《內令》一冊之外，還有（次第給予的）《百家姓》、《千字文》、《孝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千家詩》、《神童詩》等^[99]。讀書太監中的有志者，閱讀更加豐富。正如劉若愚所指出的，“凡有志官人，各另有私書自讀，其原給官書，故事而已”。劉若愚又列舉和評論他們所讀的範圍說：“皇城中內相學問，讀《四書》、《書經》、《詩經》，看《性理》、《通鑒節要》、《千家詩》、《唐賢三體詩》，習書東活套，習作對聯，再加以《古文真寶》、《古文精粹》，盡之矣。十分聰明有志者，看《大學衍義》、《貞觀政要》、《聖學心法》、《綱目》，盡之矣。《說苑》、《新序》，亦間及之。《五經大全》、《文獻通考》，涉獵者亦寡也。此皆內府有板之書也。先年有讀《字韻》、《海篇》部頭，以便檢查難字。凡有不知典故難字，必自己蒐查，不憚疲苦。至於《周禮》、《左傳》、《國語》、《國策》、《史》、《漢》，一則內府無板，一則繩於陋習，概不好焉。蓋緣心氣驕滿，勉強拱高，而無虛己受善之風也。《三國志通俗演義》、《韻府群玉》，皆樂看愛買者也。”^[100]這裏所說的是萬曆以後的晚明情形。這些宦官所讀之書，凡神宗在經筵、日講講讀的都在其中。其餘也多和他在內廷學習的相同。宦官初學的啓蒙書籍，也就是他啓蒙時所讀的書籍。內書堂學生同樣學習誦詩題詩，甚至作詩。劉若愚說“題詩”正是他們每日放學前的例行節目。內書堂的教師也是來自詞林的優秀文官。

這樣，皇帝和宦官都有著同樣出身和訓練的老師，他們的所學所習因而基本相同。學養好的太監，其書本、文字知識無疑足以勝任皇帝的宮中教師，而事實上他們也多是皇帝的啓蒙老師。由此可見，皇帝和內官在地位上有雲泥之別，但在文化學習上卻是一體的。宦官們的經史知識不只是他們的進身之助，也對皇帝深入理解和判斷講官所講的內容有助。皇帝有了諮詢宦官的方便，對於講臣所進講章的意涵，便能更有背景性的理解，也更能判斷其所講所說之確否和優劣。神宗在這些方面都有所表現。至少我們可以說，神宗在萬曆十七年不再親御講筵之後，他的經史知識不必因而沒有增長。他透過依時進呈的講章而獲得的經史知識，比起之前的很多皇帝應該有過之而無不及。

- [1] 《明穆宗實錄》，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年，卷六八，隆慶六年三月戊子。
- [2] 同上，卷六六，隆慶六年二月庚戌。
- [3] 《明神宗實錄》，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年，卷一三，萬曆元年五月辛巳。
- [4] 同上，卷一〇，萬曆元年二月癸亥。
- [5] 同上，卷四，隆慶六年八月辛未。
- [6] 同上，卷四，隆慶六年八月癸亥。
- [7] 同上，卷二〇〇，萬曆十六年閏六月癸未。
- [8] 同上，卷二〇二，萬曆十六年八月癸巳。
- [9] 同上，卷二〇八，萬曆十七年二月己卯。
- [10] 晚明太監劉若愚記載了當時內府尚存書板的書目，其中以“直解”題名的還有《女誠直解》、《忠經直解》、《孝經直解》、《四書直解》、《書經直解》、《通鑒直解》各書，見劉氏《酌中志》，北京：京華出版社，2001年，《四庫禁書》第二卷史部，卷十八，第2084頁。現在容易見到的，還有張居正等撰《書經直解》（臺南縣：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萬曆刻本）、《四書直解》（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未收書輯刊》據清八旗經正書院翻刻本《四書集注闡微直解》）等。
- [11] 轉引自樊樹志《萬曆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頁。
- [12] 《明神宗實錄》卷二一九，萬曆十八年正月甲辰朔。
- [13] 《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上編卷二五，萬曆元年。轉引自陳生璽、賈乃謙編注《帝鑒圖說評注》，鄭州：中州出版社，1996年，第4頁，賈乃謙《前言》及注3。陳生璽認爲所記誇張。

- [14] 《明神宗實錄》卷四，隆慶六年八月丙寅。
- [15] 明人對於陶大臨、馬自強二人作為《帝鑒圖說》編纂者的分工分量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認為張居正進書時不提陶大臨是不對的，見《帝鑒圖說評注》第10頁及同頁注3。
- [16] 《明神宗實錄》卷八，隆慶六年十二月己巳。
- [17] 如上文所引陳生璽、賈乃謙編注《帝鑒圖說評注》所據本。
- [18] 《明神宗實錄》卷一一，萬曆元年三月甲申。
- [19] 《萬曆起居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明末清初抄本，第1冊，第109頁，萬曆元年十月八日乙卯。
- [20] 《明神宗實錄》卷三六，萬曆三年三月癸卯。
- [21] 同上，卷四八，萬曆四年三月丁酉。
- [22] 同上，卷四八，萬曆四年三月戊戌。
- [23] 同上，卷二〇，萬曆元年十二月乙丑。
- [24] 同上，卷四五，萬曆三年十二月乙丑朔。
- [25] 同上，卷三〇，萬曆二年十月戊午。
- [26] 同上，卷五一，萬曆四年六月乙丑。
- [27] 同上，卷四〇，萬曆三年七月丁未。
- [28] 同上，卷四三，萬曆三年十月辛卯。
- [29] 同上，卷五五，萬曆四年十月庚午。
- [30] 同上，卷五八，萬曆五年正月庚子。
- [31] 《萬曆起居注》第1冊，第453頁，萬曆五年七月二十二日丁未。
- [32] 同上，第536頁。萬曆六年正月十五日丁卯。
- [33] 同上，第477—478頁，萬曆五年九月十四日丁卯。
- [34] 同上，第483—484頁，萬曆五年九月十七日庚午。
- [35] 《明神宗實錄》卷七〇，萬曆五年十二月壬寅。
- [36] 同上，卷八〇，萬曆六年十月乙巳。
- [37] 同上，卷八二，萬曆六年十二月庚子〔二十四日〕。《萬曆起居注》第1冊，第705—706頁。
- [38] 同上，卷一〇一，萬曆八年六月庚申。
- [39] 《萬曆起居注》第2冊，第93—94頁，萬曆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戊寅。
- [40] 《明神宗實錄》卷一〇七，萬曆八年十二月甲辰。
- [41] 同上，卷一〇八，萬曆九年正月丁亥。
- [42] 同上，卷一〇九，萬曆九年二月己亥。
- [43] 同上，卷一〇九，萬曆九年二月丁酉。
- [44] 同上，卷一〇九，萬曆九年二月乙卯。
- [45] 同上，卷一一〇，萬曆九年三月甲戌。
- [46] 同上，卷一一一，萬曆九年四月辛亥。
- [47] 同上，卷一二六，萬曆十年七月己未。
- [48] 同上，卷一一九，萬曆九年十二月庚戌。
- [49] 《萬曆起居注》第2冊，第197頁，萬曆九年十二月庚戌。
- [50] 《明神宗實錄》卷一一九，萬曆九年十二月甲寅。
- [51] 《萬曆起居注》第2冊，第198頁，萬曆九年十二月甲寅。
- [52] 《明神宗實錄》卷一二〇，萬曆十年正月丁亥。
- [53] 《萬曆起居注》第2冊，第320頁。《明神宗實錄》卷一三一，萬曆十年十二月戊申。
- [54] 有關張居正（等）撰《書經直解》一書的成書和刊行年份考析，參看朱鴻林·《申時行的經筵講章》，國家圖書館、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屈萬里先生百歲誕辰國際學術研

- 討會論文》，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06年[12月]，第509—533頁。
- [55] 《明神宗實錄》卷一三三，萬曆十一年二月甲申朔。
- [56] 同上，卷一四四，萬曆十一年十二月癸酉。
- [57] 《萬曆起居注》第2冊，第756頁，萬曆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癸未。
- [58] 《明神宗實錄》卷一四六，萬曆十二年二月癸酉。
- [59] 《萬曆起居注》第2冊，第355—357頁，萬曆十一年四月。
- [60] 同上，第2冊，第746頁，萬曆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壬寅。
- [61] 《明神宗實錄》卷一八四，萬曆十五年三月庚戌。
- [62] 同上，卷一九三，萬曆十五年十二月丁丑。
- [63] 《萬曆起居注》第3冊，第3—11頁。《明神宗實錄》卷一九五，萬曆十六年二月乙丑。
- [64] 《明神宗實錄》卷一九五，萬曆十六年二月丁卯。
- [65] 同上，卷二〇〇，萬曆十六年閏六月癸未。
- [66] 《萬曆起居注》第3冊，第144頁，萬曆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辛丑。
- [67] 《明神宗實錄》卷二一三，萬曆十七年七月戊辰。
- [68] 《萬曆起居注》第3冊，第486—487頁，萬曆十九年二月二日己巳；第3冊，第491—492頁，二月六日癸酉；第3冊，第493—494頁，二月十八日乙酉；第3冊，第494—495頁，二月二十日丁亥。
- [69] 同上，第3冊，第810頁，萬曆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乙卯。
- [70] 同上，第4冊，第339—340頁，萬曆二十一年五月十四日丁卯。
- [71] 同上，第4冊，第341—342頁，萬曆二十一年五月十六日己巳。
- [72] 同上，第4冊，第870頁，萬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日癸丑。按，是日册封敬妃、端妃禮成。
- [73] 同上，第5冊，第55頁，萬曆二十三年二月八日。
- [74] 同上，第5冊，第89—90頁，萬曆二十三年三月九日壬午。
- [75] 同上，第5冊，第105頁，萬曆二十三年四月八日庚戌。
- [76] 同上，第5冊，第499頁，萬曆二十五年二月壬戌朔，初次題；第513頁，十五日丙子再題。
- [77] 同上，第7冊，第376—377頁，萬曆三十年閏二月十九日壬子。
- [78] 同上，第7冊，第390頁，萬曆三十年閏二月二十八日辛酉；第393頁，三月五日丁卯。
- [79] 同上，第7冊，第400—402頁，萬曆三十年三月十五日丁丑。
- [80] 同上，第7冊，第450頁，萬曆三十年四月六日丁酉。
- [81] 同上，第7冊，第563頁，萬曆三十年十月八日丙申。
- [82] 同上，第7冊，第872—873頁，萬曆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甲辰。
- [83] 同上，第8冊，第374—375頁，萬曆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戊辰。
- [84] 《明神宗實錄》卷四一六，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癸卯。按，萬曆三十三年《起居注》不存。
- [85] 同上，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己未。按，萬曆三十三年《起居注》不存。
- [86] 同上，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壬戌。按，萬曆三十三年《起居注》不存。
- [87]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二五，第634—635頁，“大學衍義”條。
- [88] 《萬曆起居注》第8冊，第480—481頁，萬曆三十四年三月二日庚午，三日辛未。
- [89] 同上，第522頁，萬曆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辛酉。
- [90] 同上，第530—531頁，萬曆三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甲子。
- [91] 同上，第660—661頁，萬曆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丁巳。
- [92] 同上，第892頁，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辛巳，以及以下三年十二月內同樣事情記注。
- [93] 按，萬曆三十八年、三十九年《起居注》不存。《明神宗實錄》卷四七八，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甲午：“大學士李廷機、葉向高年終遵例以撰過講章及《通鑒纂要》類寫裝潢進呈。”
- [94] 《明神宗實錄》卷四八一，萬曆三十九年三月戊午。按《起居注》是年不存。
- [95] 同上，卷四八二，萬曆三十九年四月乙卯。按《起居注》是年不存。

- [96] 按，《起居注》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月，四十二年一年，四十三年正月至六月均不存。
- [97] 《明神宗實錄》卷五四〇，萬曆四十三年十二月乙丑。按，《起居注》此事未見，但有循例請二月開講事。
- [98] 同上，卷五七八，萬曆四十七年正月戊申。
- [99] 劉若愚：《酌中志》，卷十六，第 2008 頁。
- [100] 《酌中志》，卷十八，第 2081—2082 頁。